

瞻性研究。针对虚拟货币监管、跨境数据流转、数据资产确权等现实法治难题，凝练本土法理规则，健全数据要素市场法治体系，筑牢国家数字经济安全屏障，推动中国数字法学理论与时俱进。

（三）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传播力与知识贡献

自主数字法学体系兼具本土性与开放性，并非封闭的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需立足中国治理经验，直面全球数字治理共性难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凝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通过打造融通中外的数字法治话语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规则、跨境数据治理、人工智能规制等领域的规则制定，主动贡献中国法治智慧，提升我国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

五、建构中国自主的数字法学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建构完整的数字法学知识体系，需要从理论、人才、方法、话语四大维度协同发力，构建可落地、可推进的建设机制。理

论层面，突破西方单一权利范式，创新“利益—权利”二元共生理论，围绕数据要素四权分置、平台—数据—算法三维治理构建原创学术体系。人才培养层面，打破传统单科法学教育模式，布局数字法学、计算法学、涉外数字法治等新兴学科，优化评价体系，培育复合型数字法治人才。

研究方法层面，构建以“平台—数据—算法”为核心的第五科学范式，推动法学研究向数据驱动、系统治理、交叉融合转型，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开展实证法学研究，兼顾技术创新与算法规制，实现技术理性与法治理性统一。话语传播层面，主动设置全球数字治理议题，依托2025年10月成立的“全球法学教育合作联盟”等平台，输出中国法治经验，应对长臂管辖、数字贸易壁垒等涉外法治问题，持续提升我国数字法治的国际影响力。未来，我国将持续推进数字法学理论与制度创新，打造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的数字法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数字法治建设赋能。

青瞻未来

自中国人民大学-西湖大学未来人类联合研究院成立以来，为深化两校合作，研究院设置了“青年研究员”项目，采用项目制形式，选拔并支持两校35周岁以下、处于学术创造力黄金期的优秀青年学者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经函评与会评答辩，首届“青年研究员”项目遴选出20余位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涵盖科技进步的人文反思、实验室技术产业化、国际形势研判与国家治理咨政等领域。本刊特推出“青瞻未来”栏目，邀请已立项的青年研究员展望前沿领域，表达青年一代对未来人类的思考，为关心未来人类的各界人士提供参考与指引。

陶欢：科技右翼的崛起与美国权力结构的重组

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后，一个以硅谷精英为核心的新兴政治力量——“科技右翼”，正式登上美国政治舞台。这股力量从

一种边缘化的技术政治哲学，通过关键人物的长期布局和政治实践，完成与硅谷资本、技术权力及共和党议程的深度整合，进而不仅改变

了美国国内的权力格局，更将其理念投射于对外战略，推动美国霸权形态向以技术标准为核心的非对称体系演进，从而对全球秩序及中国的安全发展环境构成多维度、系统性的新型挑战。

一、思想源流：追溯科技右翼的兴起过程

“科技右翼”并非美国2024年大选的偶然产物，而是源于右翼加速主义思潮数十年演进的脉络之中。加速主义从早期哲学构想，经英国控制论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熔炼，最终裂变为左、右两翼思想历程。在此基础上，以彼得·蒂尔为核心的“PayPal黑帮”成为将这一边缘思潮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的关键纽带。蒂尔通过思想传播、资本整合、国防安全嵌入及政治人事布局四个层面，系统性地推进了硅谷科技精英与右翼民粹势力的合流。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的监管政策——从反垄断到人工智能伦理再到未实现资本利得税方案——构成系统性外部压力，迫使秉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硅谷建制派，与具有反建制色彩的科技右翼在利益层面走向合流，最终形成以“有效加速主义”为旗帜的“硅谷共识”。科技右翼的崛起并非单纯的选举投机，而是一场酝酿已久、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政治运动。

二、政治整合：科技右翼如何将政治影响力兑现为实质性权力

选举运作的数据揭示了硅谷政治献金在2024年大选中的结构性转向，科技右翼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介入选举、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政权核心。一张涵盖科技、国防、金融、行政等24个关键岗位的人事任命表，有力地证明了该群体已从体制外的游说力量转变为体制内资政与决策的主导者。在行政层面，以“单一行政理论”为指引，通过行政令扩权、财政权集中与“监管回撤”机制，系统性削弱国会与独立

机构的制衡功能，构建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主导模式；在国防创新层面，通过预算结构性引流、采购体制由“合规优先”向“效率优先”转型，以及重塑“旋转门”路径，推动国防资源向硅谷倾斜，形成挑战传统军工复合体的“科工复合体”；在金融领域，通过立法与人事双管齐下，推动加密货币制度化，冲击华尔街主导的支付结算与货币控制体系。科技右翼并未止步于选举胜利，而是以民粹动员、技术威权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的方式，系统重塑着美国的国内治理生态。

三、从国内兑现到对外投射——科技右翼如何将其权力逻辑投射于对外战略，塑造新的对华战略挤压态势

“金穹”“星际之门”与“创世纪计划”三大战略的部署协同，标志着美国正将国家安全与技术霸权深度绑定。在此基础上，对华战略挤压的内涵层面有三：一是通过“硅和平”倡议与“金库工程”等机制，构建将中国边缘化的排他性全球技术与供应链体系；二是构建“动态调整”的出口管制体系，诱使中国形成对美国技术架构的路径依赖；三是对取得技术突破的中国企业实施精准打击。科技右翼正以军事领域的技术标准作为支点，向民用产业与全球治理规则领域渗透，形成从军事到民用的多层次技术规则网络。这种趋势若形成，将实质性阻碍中国将应用创新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制定权。此外，如果将视野拓展至西半球，以“唐罗主义”为分析概念，科技右翼对关键矿产的战略布局将传统地缘政治竞争与科技产业链重构深度捆绑。

四、研究贡献

这篇文章的核心贡献在于，它并非孤立地描述一个政治现象，而是构建了一个跨越思想史、国内政治学和国际战略学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清晰地揭示了技术权力如何与政治权力合流，并以此重塑一国之内外交战略方

向。文章最终落脚于对中国的战略启示，在批判科技右翼所代表的排他性技术民族主义

的同时，也隐含着对一种更具包容性、以人为本的科技全球治理路径的深沉期待。

菅泽华：人工智能时代下全球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中国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与数字技术的迭代，为后发国家实现发展追赶提供了技术可能，尤其是人工智能作为通用型技术，本应成为缩小全球发展差距的普惠性工具。但现实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全球贫富分化达到二战后最高水平，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22倍扩大至2023年的28倍，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马太效应。

现有研究对这一悖论的解释分为两大脉络：新古典经济学将不平等归因于后发国家的人力资本不足、技术吸收能力薄弱等内部因素，回避了全球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国际垄断、中心—外围理论揭示了不平等的制度本质，但大多停留在静态结构分析，未能以资本运动为核心，揭示不平等的动态累积机制。基于此，本文以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循环为核心主线，揭示全球不平等的动态生成逻辑，并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对这一逻辑的重构与放大效应。

二、全球不平等的核心根源：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循环与剩余价值转移

全球不平等的本质，并非技术差距带来的自然发展差异，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循环体系中，剩余价值跨国转移与中心国家集中实现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总公式($G-W \cdots P \cdots W'-G'$)，在全球化时代拓展为“中心国家预付垄断资本—全球生产要素配置—外围国家生产过

程—垄断定价商品—中心国家剩余价值实现与积累”的全球循环体系。

在这一循环体系中，分工、技术、制度、权力不再是静态的垄断支柱，而是嵌入资本循环全流程的四大动态机制：其一，分工机制是资本的全球空间配置机制，通过全球价值链层级切割，将外围国家锁定在低增殖的加工制造环节，为剩余价值生产奠定空间基础；其二，技术机制是资本增殖的强化机制，通过核心技术垄断扩大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差额，放大超额剩余价值规模；其三，制度机制是资本流通的保障机制，通过主导全球贸易、知识产权规则，保障垄断资本自由流动与剩余价值跨国回流；其四，权力机制是资本循环的强制保障机制，通过科技遏制、金融制裁等国家手段，阻断外围国家的追赶路径，维护垄断循环的稳定性。

四大机制的协同作用，形成了“剩余价值中心实现—垄断资本积累—壁垒强化—剩余价值转移规模扩大”的循环累积闭环，这一闭环不存在自发收敛的市场机制，最终导致全球不平等的持续固化。

三、人工智能时代的垄断重构与不平等放大效应

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并非加剧不平等的根源，但其被国际垄断资本掌控后，全面重构了资本循环的四大机制，成为垄断资本循环的加速器，使全球不平等进入了更强的自我强化路径。

在分工维度，人工智能重构了全球价值链的层级结构，垄断资本牢牢掌控大模型训